

# 集体记忆、社区舆论与村庄福利： 农村家庭养老的持续机制

梁 晨

提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变，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够完善，这使得农村养老问题日渐凸显。本文以华北某村为案例，结合当下农村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变化现状，讨论农村老人自身的行为逻辑与村庄内部特征及约束，并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在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得以持续的原因。本文认为，村庄社区经验传承和软硬约束具体表现为“集体记忆”“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影响农村养老：村庄内的经验会塑造集体记忆，从维护家庭内部和谐角度出发实现养老目标；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从软硬两方面约束着子女的养老行为，使得农村家庭养老体系在社会的变迁中可以持续。

关键词：家庭养老 集体记忆 社区舆论 村庄福利

## 一、社会变迁中的农村家庭养老

目前中国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截止 2020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 亿人，在总人口中占比为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 亿人，占比为 13.50%。<sup>①</sup> 预计到“十四五”期末，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人，中国将从轻度老龄化阶段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而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更为严峻，预计到 2025 年，乡村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 25.3%（魏后凯、杜志雄编，2020）。与城市相比呈现出老龄程度更深、困难老人更多，养老压力更大等特性。在中国，家庭养老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父母计划依靠子女解决未来养老

---

① 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网址：[http://www.stats.gov.cn/zjtj/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693.html](http://www.stats.gov.cn/zjtj/zdtjgz/zgrkpc/dqcrkpc/ggl/202105/t20210519_1817693.html)，访问日期 2022 年 1 月 8 日。

问题，而子女在道义和法律上都有赡养义务。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并占据主流地位，这些变化将导致家庭作为养老保障主体的功能弱化（Goode，1963）。

这种理论预测在现实中得到了一定验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类型由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家庭户平均人数基本上保持在5.3人的水平上，1990年缩减到4.0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而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5人户的比例下降到16.7%，3人户比例上升到24.9%；<sup>①</sup>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3人户家庭在农村家庭中占比最多，为22.34%，农村家庭户均人数下降到3.34人。<sup>②</sup>伴随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生育政策的推行等多方面因素也共同重塑着代际关系（杨菊华、李路路，2009）。在宏观人口背景下，由于家庭养老面临着经济上供养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匮乏等突出问题，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举步维艰。老年人因生活困难、疾病困扰而自杀的现象时有发生（刘燕舞，2016）。造成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社会养老氛围淡化、土地保障功能弱化以及社会保障功能不足等“结构性”因素；二是村庄共同体中传统长幼秩序弱化、中青年崛起，以及女性地位上升带来的婆媳矛盾显化等“关系性”因素；三是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和减轻子女负担等“主体性”因素（钟涨宝、杨柳，2016）；四是由于“个体化”现象在全国蔓延，年轻人只愿享受自由不愿承担责任造成的“无公德的个人”现象等社会文化因素（阎云翔，2012）。

即便如此，家庭养老仍然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虽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传统家庭养老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但当前来看效果有限（张川川、陈斌开，2014）。无论是经济支持还是日常照料，农民的养老仍主要靠家庭解决。有学者利用西部省份的调查问卷，通过测量现实与预期的差异来评估农村家庭养老的弱化程度。测量结果显示，相比预期，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支持弱化了25.0%，生活照料弱化了5.6%，精神慰藉弱化了30.7%（于长永等，2017）。尽管农村家庭养老显示出弱化的趋势，但是生活照料方面弱化的程度不大。大多数农民

① 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5rp/index.htm>，访问日期2022年1月8日。

② 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访问日期2022年1月8日。

在父母年老体弱的时候会回到家乡照顾父母，在未来自己年老之后，也依然选择家庭养老作为自己的养老方式。这说明，家庭养老不仅是农民理性而无奈的选择，其背后更有深层次的原因。

有学者从代际关系的视角解读当代农村，尤其是在资源匮乏地区的农村养老问题。家庭代际关系是一种建立在血缘或收养基础上的家庭内不同辈分成员之间的纵向关系（王跃生，2010）。费孝通先生认为，与西方家庭的“代际接力”模式不同，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为“反馈模式”，即亲子两代互相负有责任，父母有抚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费孝通，1983）。但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传统代际关系中亲代对子代的专制不复存在，代际关系更为平等，甚至重心下移，出现‘逆倾斜’”（王雪娇，2019）。另一方面，有学者将代际关系区分为“家内代际”和“家际代际”，传统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以家内代际为主，而在当代农村，子女婚后与父母分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女儿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养老，出现了更多的“子代”核心家庭和“亲代”核心家庭，家内代际养老向家际代际养老转变（王跃生，2010）。

家际关系研究把看待农村家庭养老的视角从家庭内部扩展开来。在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不仅是家庭内部的事，还涉及家庭之间（如兄弟姐妹、亲戚）的关系，以及村庄社区内的关系。无论我们将现代村庄视为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费孝通，1998），还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0），村庄内部存在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都会让同一个村庄的人在社会网络中被勾连起来。因此，村庄可以被视作一个共同体，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秩序和文化规制（梁晨，2019）。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共享一套生活惯习和文化规制，并相互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养老方式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社区对于老年人的意义不仅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依托、互助养老的场所和链接服务资源的平台，更是一个全场域的生活情境。人们对自己老年生活的规划习得来源于此，村庄公共生活和文化规制对人们的家庭关系和家庭养老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跳出家庭内部，在家际关系，甚至村庄社区的历史传承和村庄社区约束中看待家庭养老的现状，并从老年人的生活体验、家际关系和社区角度理解转型中的广大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体系何以可能。对此，本文以华北地区西水村为典型案例，从农村老年人的行为逻辑与村庄内部特征入手，结合历史纵向分析（即村庄社区的历史传承）和当前的横截面分析（即当下的软硬约束）分析农村家庭养老得以持续的机制原因。

本文的田野地点是西水村<sup>①</sup>，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杨善华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对其进行了二十多年的跟踪调研，先后访谈了村庄近一半的家户，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和普通村民，涵盖了老年人、妇女等各类社会群体，积累了数以百万字的访谈资料和文献资料。本人从2006年开始先后十余次到西水村调研，对村庄人物和关键事件有一定了解。本文使用的访谈材料主要来自2007年、2008年和2017年的调研，访谈对象包括存在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对上一代有养老责任并且即将需要养老的中年夫妇以及参与调解家庭矛盾的村干部。

西水村地处华北地区，2020年该省农村老年人的基础养老金为每月108元，在全国排名第18位，水平并不高。由于西水村是水库移民村，当年移民过来的老人还能拿到每年几百元的移民补贴。此外，当年西水村的乡村工副业开展得早，现在的老年人当时大部分在工厂或养殖场工作，因此多存有一些积蓄。西水村的老年人相比贫困地区的老年人积蓄略丰厚，但也不能和城市每月有固定收入的老年人相比。本文从家庭和个人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方面展开，分析村庄社区因素，如集体记忆传承、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对农村养老方式的影响（见下图）。一方面，村庄生活经验会塑造集体记忆，老年人会遵从前辈的经验和教训，致力于在儿女之间平衡利益，从维护家庭内部和谐的角度出发达到安度晚年的目标；另一方面，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存在从软硬两方面对子女的行为进行约束的可能。这些因素从内外两方面为农村家庭养老体系提供支撑，使得在社会剧烈变迁的当下，家庭养老体系依然可以存在并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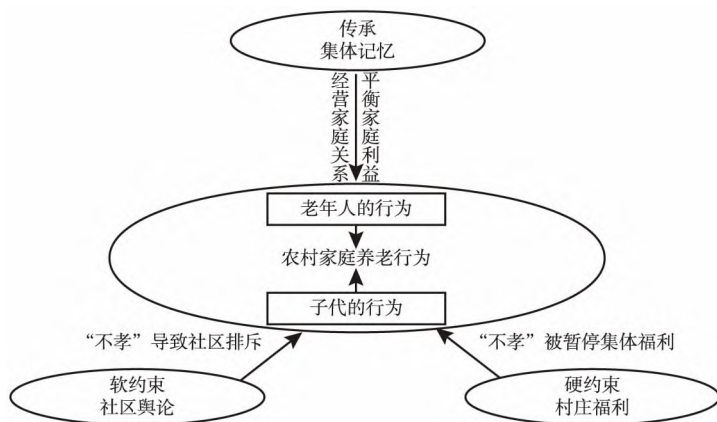


图 村庄社区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① 文中的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 二、集体记忆及其传承

养老需要亲子两代共同参与完成，代际关系影响家庭养老。正如上文所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代际关系发生了变化，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的逻辑逐渐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的逻辑所取代，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范成杰，2013）。家庭内部权力关系也从父母权威变得更为平等，甚至子代更为强势。人们需要逐渐适应这种关系转型，根据社会环境和周围发生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具体到每个家庭，老人与子女的关系有所不同，有的关系和顺，有的略显紧张。而村庄内流传的一些故事会提醒一些老年人适时调整与子女的关系，也可能让子女找到与父母关系紧张的原因和借口，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的作用。

### （一）集体记忆及其作用

哈布瓦赫（2000：68—69，71）认为，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不可能存在的，原因在于人类记忆所依靠的三大支柱——语言、逻辑、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获得的，即“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而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个人经验记忆与神话、历史一样，都是经由口述或文字传递的社会记忆，在某种社会情境中作为“文本”流传，并且通过语言、文字的文化符号意涵及其特定的叙事结构影响人们的个人经验建构，强化相关的社会情境与此社会情境中人们的集体行为，因而形成社会现实与历史事实（王明珂，2003）。

村庄中的集体记忆可以经由故事、传说传承下来，也可以经由一个具体的物件、建筑承载。村庄中的集体记忆有两个作用：一是对集体的作用，塑造社区共同体的团结，成为村庄凝聚力和传承的代表；二是对个体生活的作用，让生活在村庄中的个体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给村庄中的个体以支持。前者如近年来尤其是南方地区较多出现的重建祠堂、村史馆，以及政府组织的“文明村镇”“美丽乡村”等奖项的评选活动，这些举措帮助塑造了促进村庄团结的集体记忆。对个人而言，集体记忆也会通过习得和内化而发生影响。村庄作为社区共同体，存在公共场域和公共生

活，人们会口耳相传一些之前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件，经过公开或私下的议论，形成较为完整和统一的评价，学习其中的经验，吸取教训。在家庭养老方面也是如此，老年人和他们的儿女都会从以往的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作出合理的选择。

## （二）“以史为鉴”：左金凤的赡养悲剧与李老太的养老谋算

### 1. 左家的赡养悲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农村的赡养问题比较突出，但大多是家庭内部矛盾，经由村委会出面调解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左金凤家的赡养矛盾却特别严重，她甚至因为赡养问题把儿女告上了法庭。

左金凤有四个儿子，其中二儿媳妇不养老人，家里矛盾很大，镇司法所对此进行了多次调解，还为他家专门办过家庭学习班。但是由于老二本身收入低，家里有三个孩子，负担较重，经常不能按时把钱和米面给老母亲，轮到自己照顾的时候也不让左金凤进门，左金凤一怒之下将孩子们告上了法庭。左金凤其实只想告二儿媳，但是镇里的司法部门告诉她，要告就得所有儿女一起告，不能只告其中一个。这样一来，不仅其他三个儿子和儿媳对左金凤有意见，左金凤唯一的女儿郭小鸣也觉得很冤枉。郭小鸣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不希望母亲用上告法庭的方式来解决，因为这在农村是件很丢人的事，邻居们都说，“她（左金凤）给孩子们丢人了”（20080201LWR）。因此，左金凤状告子女的行为在郭小鸣和其他村里人看来，是“没分寸”“不合适的”。

而且和儿女打官司也没有达到老人的预期，左金凤同其二儿媳的争吵仍然没有停止。二儿媳这回倒是让左金凤进门了，也给左金凤送饭，但送的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冷饭，其他儿媳也因为被告上了法庭而不愿承担左金凤的赡养责任。不久，左金凤就离开了人世。在村民看来，左金凤的行为非常不可取，一是告状丢人，二是结局悲惨，这对其他村民起到了很大的警示作用。

### 2. 吸取教训的李老太

左金凤因为赡养问题状告子女的事件虽然过去很多年，但却没有被淡忘。直到现在，村里中老年人提起左金凤还心有余悸，更有人从中吸取教训，获得了指导自己行动的经验，其中第一条经验就是不要和儿女打官司。

在村里人看来，左金凤虽然使用了法律武器，但这么做是不明智的。比如刘明福的妻子李老太认为左金凤状告子女的行为是很不明智的“她也是脾气又坏，

那媳妇们和她也不好。她在屋里炕上躺着，她叫，外边的人们听见也不说话，让她倒点水吧，人家谁也不说话，也不往她屋里走，也可受罪了。我都是说，咱受点屈吧，别和孩子们闹，弄僵了也不好。咱也不跟她学……我早心里想过了，孩子们不会说不管我，我要饭也不会去打官司告他，饿死也不告，告完更受罪”（20071001LLT）。告状丢人，与子女闹上法庭的结局更加悲惨，这个印象深深印在村民的脑海里。

李老太身上体现的第二条经验是调和儿子和女儿的关系，让女儿也承担养老责任，给自己“留后路”。李老太认为左金凤还有一个做错的地方：她向女儿抱怨儿孙媳，导致儿女关系不好。“（左家的事）你说老人也有责任。你跟闺女说，你跟小子们不好，闺女回去跟儿子媳妇又闹又吵，小子们还能养你？”（20071001LLT）李老太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应该调和儿子和女儿的关系，并且让女儿也承担养老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法律规定了女儿与儿子承担同样的养老责任。虽然目前大部分农村地区依然秉承着儿子养老的传统责任伦理，女儿只是偶尔来照料，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也不继承老人的遗产，但是靠女儿养老逐渐成为老年人心中的一个备选选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把女儿纳入赡养责任人范围，但具体方式方法各有不同。在农村盛行的赡养伦理下，李老太没有强行将法律规定的赡养义务搬出来，而是用自己的方式，既维持了儿子和女儿之间的和谐，又把女儿纳入责任范围之内。李老太和老伴刘明福靠经营养鸭场攒下十几万元，在老伴去世之后，李老太给两个儿子每人分4万元，给女儿2万元，自己留下几万元作为今后的日常花销。她表示虽然儿子儿媳都很孝顺，但依然会担心自己万一瘫痪在床之后的照料问题。同时她还要照顾女婿的看法，避免女婿和女儿之间因为赡养老人产生争执。但又怕媳妇对自己给女儿钱有意见，万一引起儿女之间的争执就得不偿失了。李老太先给儿子媳妇做好了思想工作，“我跟小子们说，你们指出来给你姐姐。他们提出来给他姐姐的。大小子指出来的，她姐姐说我不要，我说粘住你了，到时躺着你也得管我。”并且特意表示，“媳妇们都同意，俺家的媳妇们都可好了”（20071001LLT）。在左金凤赡养悲剧的启发下，李老太设计主要依靠儿子、但女儿在必要时也要承担赡养责任的行动策略，同时也努力调和子女关系，让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满意。李老太在保持家庭和谐的基础上，成功地迈出了自己养老计划的第一步。

左金凤的悲剧给村里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这种记忆以故事为载体传承下来，让一代又一代老年人对自己的养老计划不断反思，进而调整养老策略。李老太

就受其启发，总结了几条经验，比如不和儿女打官司，致力于在儿女之间做出平衡，维护家庭和谐的同时让自己在必要时可以寻求女儿的帮助等。在这种情况下，村庄集体记忆传承对老人如何营造家庭关系具有积极意义，让老人从家庭内部关系出发，为自己的赡养铺好路，从内在解决养老困境。左金凤家的悲剧给村里人带来的不只是口耳相传的集体记忆和经验教训，还直接影响了村庄舆论。

### 三、社区舆论的软约束

#### （一）社区舆论的作用

在传统村落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在同一片区域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人与人熟识，村庄生活相对透明，社区舆论的约束作用较强。而人们关系紧密，相互依靠，社区舆论才会起作用。在现代城市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区域分开，相互不熟悉，社区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都相对困难。可以说，熟人社会是社区舆论产生和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当下的农村地区，虽然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但村庄内部依然是比较紧密的共同体，熟人社会的氛围使得社区舆论依然存在于大部分农村。

集体记忆是村民对以往发生事件的评价，从中吸取经验和智慧，带有较强的历史性特征，而社区舆论则更注重当下，代表村民对当下发生事件的态度，直接体现村庄社区对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养老产生的作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不孝”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指责，尤其对要在村庄中谋生活的人来说，被贴上“不孝”“虐待老人”的标签之后，将在生产和生活各方面都受到村里人的排斥，甚至“不肖子孙”的亲朋好友也会被牵连。社区舆论产生村庄中的“道德分层”（陈文玲，2008），直接关系到每个村民的社会地位，让村民面临被社区共同体排斥的风险。传统中国不仅是农立国，更是以孝立国，孝是最重要的善行与德行。因为在诸善之中，孝最具有超越性；在诸德之中，孝最具有普遍性（杨国枢，2006）。村庄“官方”，即村委会也会对此进行刻意引导。在村委会门口的宣传栏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告牌“善行功德榜”里的四个人中有两个是家庭和睦、孝顺老人的普通中年妇女，这是普通人登上村公告牌的唯一可能，可见村庄对孝道和道德的倡导。



## （二）两起极端事件与“洗刷”恶名

说到社区舆论，不能不提村庄社区生活情境。据老一代村干部聂修贤介绍，西水村的“养老情况，80%、90%吧，不能说是好吧，但也是不错的，真正好的也很少，真正坏的也是个别数的，两个极端都属于特殊情况。占绝大多数的是不错的，老人和子女能够享受差不多相同的待遇，按道理说吧，也就可以了”（20080201QLX）。也就是说，大部分家庭都能维持在基本的养老水平。

极端不孝的情况也存在，甚至导致了老人的自杀。村里一个老人山成因为年老多病喝农药自杀。据村里人说，“（山成）喝农药死了。死了死到炕上了，这山成受不了他儿媳妇的虐待，山成儿子也管不了这儿媳妇，当时他喝上这药，他去死了，不管老婆了，老婆她死吧，又瘫，走不了，躺到那炕上了，屁股底下冻着冰，给送饭也不管吃不吃，就扔在旁边，碗也几天不刷，那可惨了。”（20080131SMZXF）山成及其老伴儿遭受的虐待着实让大家看不过眼，都在背后互相议论，表达出对这种对待老人的方式的不认可，山成儿媳妇也成为众人口中“恶媳妇”的代表，经常被村民当成反面典型来教育自己家儿孙。

几年之后，孙栓堂老人也喝农药自杀了。孙栓堂得了比较严重的类风湿病，几个儿子又都过得不是很富裕，所以老人不愿拖累子孙，选择了自杀结束病痛、减轻子女负担。与山成家不同，孙栓堂的儿女却没有被村里人鄙视。这是因为他提前做了舆论准备。“这个事，他喝药，发生是可突然了，但事发生以后，人们回顾这个事，发现早有预兆了。发生这预兆就是什么时候，光夸这孩子们好，这个老大怎么孝顺，老二怎么孝顺。在外面说，人们都不在乎这个。实际上这是一种预兆。怕（死了以后，村民们）说孩子不好了，提前给孩子造舆论。”（20080201QLX）

从两起自杀事件的始末和村民对他们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庄社区舆论在背后的作用。如果说第一个自杀事件中，老人的绝望自杀和子代不孝影响了这个家庭在村庄中的形象，那么第二起自杀则多少带有“利他性”的意涵，是一位老人在充分了解熟人社会中社区舆论对个体和家庭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为维护其家庭和子孙的“面子”做了最大努力去“洗刷”儿孙和整个家庭的恶名。

村庄中也存在用孝敬老人来“洗刷”恶名的事件。前文提到的左金凤赡养问题中，左金凤的“糊涂”和二儿媳的“不孝”让全家都受连累。她的女儿郭小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即孝顺公婆来“洗刷”恶名，在社区舆论中赢回声望。她丈夫孙文贤在2002年生了脑瘤，到北京住院做了开颅手术，郭小鸣日夜照顾丈夫。当时她的

公公也因为胃病住院手术，虽然自己的丈夫也在住院，家里经济很困难，但是郭小鸣夫妇依然和孙文贤的两个兄弟平摊了公公的手术款，并且抽出时间去医院照顾公公。“他拉着我的手，不让我走。我就说，‘我不走，我不走，你放心’。我就守着。他睡了两个钟头，就醒了，眼睛睁开，看看我，说他要喝水。开始用吸管给他吸，他怕呛到，一咳扯到伤口疼。我就想了那个办法，把棉球放在他嘴里，让他渴的时候就自己吸，就不怕呛到了。他就很喜欢，说，‘这个办法很好’。”（20071005SMZFF）她努力做一个悉心照顾丈夫的好妻子、孝顺的好儿媳、通情达理的好妯娌，以此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并且通过对这一事件不断的讲述，向村庄里的人们展现自己团结妯娌、孝敬老人的形象，最终洗刷了自己身上受娘家母亲和弟媳连累所加载的恶名。通过洗刷恶名，树立良好口碑，郭小鸣和孙文贤的小家庭成为了西水村口碑最好的人家之一。

从两起自杀事件和郭小鸣的行为可以看出，虽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代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村庄“熟人社会”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里依然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非“隐名匿姓”的现代社会。在村庄中，不孝会有恶名，孝顺老人能够“洗刷”掉以往的恶名，而老人会尽力维护自己家庭的名声，甚至自杀之前也要给儿女留下好名声，帮助儿孙“洗刷”掉恶名，可见社区舆论中名声的重要性。有追求的村民需要保持好名声来保证自己处于“道德分层”（陈文玲，2008）的上层，这样才可以在村庄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更多资源。

## 四、村庄集体福利的硬约束

### （一）村庄集体经济与集体福利

村集体福利的前提是有村集体经济。有集体经济作为保障，才可能为村民提供福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生产队和大队承担着农村生产和生活全方位的功能。这时农村的基本福利由社队承担，如困难户的救济、五保户的养老、基本的医疗卫生和教育等，虽然福利水平普遍较低，但社队承担着基本的保障责任，让社员获得一定的安全感。但是这些福利随着社队体制的解体逐渐消失，在 21 世纪之后逐渐由国家承担起来，村庄不再承担类似的福利。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大多数村庄逐渐推行分田到户的政策，由各家各户自行

发展。另外，部分村庄保留一定集体土地，用以发展乡村企业、盖厂房、集体农场等集体经济。由于种种原因，村庄经济发展水平、集体福利等方面开始出现分化。就西水村来说，80年代将为数不多的田地分田到户的同时，大队和生产队陆续将60年代至70年代开始积累的工副业摊点转包给个人，承包工厂摊点的个人交给大队和生产队占地费，这笔占地费在村里俗称“双八百”，即每亩地每年交夏粮800斤、秋粮800斤，一般采取折算成现金缴纳的形式。工副业发达的西水村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用占地费修建了扬水站、幼儿园、小学校，甚至由西水村的3位工厂主出资修建了通往县城的水泥路。但这时期村集体提供的福利主要是共同使用的公共品，缺少针对个人的福利。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乡村企业效益下滑，承包费缴纳不及时，多数工厂由于亏损严重不能按时、按规定缴纳。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最初的十年中，西水村的村庄公共品供给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也没有针对各家各户的福利提供。

2012年新一届村班子上任之后，在县城里开公司的村主任基本兑现了他在竞选时提出的福利承诺：村民可以在一定额度之内享受免费的浇地和生活用水；自费8000元给村里安了路灯；将自己的村主任工资全额捐给贫困户和老人，每户每年发400元。这种用“撒钱”提供村庄福利的方式为大多数村民所拥戴，获得了群众支持。2015年和2016年，西水村先后拿到了县移民局的“花园式新农村”项目和省“美丽乡村精品村”项目，2016年到2017年逐渐建起了菊花种植和光伏发电产业，建立起经济合作社。全村经过土地流转共流转出12亩土地种植菊花，并购置一台烘焙机器用于菊花烘焙，预计亩产毛收入在3万元，2017年成功注册了商标得以上市。光伏发电产业也投入巨大，光伏板安装在公共建筑和村里靠近主路的27户人家的屋顶，预计理想情况的发电收益每年在120多万元，算上损耗和税收，预计每年收入七、八十万元左右。这些收入都将在量化之后分到每个村民手中。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阶段的村集体除了承担村庄公共品如免费自来水、路灯、道路修缮等，主要提供福利的方式是将收益直接给到各家各户，这也使集体对个人的约束能力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 （二）“不孝子”被暂停村庄福利

《西水村村民自治章程》（下文简称《自治章程》）对子女赡养老人有明确规定。第十二章社会治安管理的第五十条规定，村民有“不尊老爱幼，不孝敬老人、虐待妇女和儿童的”，按情节轻重和认错态度好坏，分别处以批评教育、当众检查

或书面检查、移交公安或司法机关处理；第十五章村风民俗的第六十六条规定，严禁虐待、遗弃老人，树立尊老爱幼的好风气，按家庭协定，及时给老人送交抚养费。《自治章程》要求本村村民应自觉遵守章程，如有违反，轻则批评教育或依章程执行罚款，重则革除村民福利待遇。有了针对各家各户的集体福利和规章制度的明确规定，村集体就有了约束村民行为的抓手。

西水村有一家刘姓祖孙三代，老刘和刘爷爷年纪大了，小刘兄弟俩分别成家各自生活。小刘兄弟俩不愿承担对父亲和爷爷的赡养责任，老刘和刘爷爷无奈之下找到村委会。村委会调解要求小刘兄弟俩每人负责赡养一个老人，既要提供经济支持也要照料生活，也就是说要给钱也要照顾老人。村干部在调解的时候明确提出，如果两兄弟不养老人，村里就把给他们的福利都暂停，包括免费使用的自来水和合作社分红，直到他们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为止；甚至坚持要求两兄弟把今后五年老人的赡养费交到村里的经济合作社<sup>①</sup>，由合作社每个月发给老人。如果孩子们表现好，这笔钱就退还给他们，由他们自己赡养老人，但村委会依然会持续监督他们。从2015年起，西水村发生了3起类似的老人赡养调解事件，经由村委会调解都已经解决，据村委会副主任反馈“现在孩子们对老人还挺好的，不光给钱，也给做饭，去医院也管”（20170708LBB）。可见“约束”不仅可以以村规规定惩罚的面目出现，还可以以暂停福利的形式发生。在西水村，村集体经济发展之后，村集体对村民的约束手段变得更多元，福利和集体资源可以作为手段来“约束”村民，村民有错误的行为就暂停福利供给，村委会的权威重新被树立起来，同时，集体也成为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可以依靠的力量。村集体对老年人权益的提倡使得村集体作为裁决者，代表权威帮助老年人维护权益，使得家庭养老体系继续维持下去。

## 五、小结与讨论

本文从村庄社区视角出发，从农村老人的生活情境、行为逻辑和村庄内部特征入手，分析了农村家庭养老在社会转型时期还得以持续的原因。文章以西水村家庭

---

<sup>①</sup> 按规定村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没有经济职能，因而不能收款，而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社可以，村社合一的情况下，合作社可以承担起这部分功能，与村委会共同起到一定治理作用。

养老事件为例,分析了社区层面的历史经验传承和现实软硬约束,具体表现为集体记忆传承、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对村民的家庭养老的影响,三者的共同作用使得村庄在家庭结构和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依然得以持续。

作为熟人社会,村庄有公共场域和公共生活,村庄里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口耳相传,会形成较为完整和统一的评价,成为经验或教训。这些经验会塑造集体记忆和个人行为,提醒老年人适时调整与子女的关系,致力于在儿女之间平衡利益,维护家庭内部和谐。如果说集体记忆让老年人通过主动调整自身行为来获得舒适的晚年生活,那么村庄社区舆论和村庄福利则是从软硬两方面对老年人子女的行为提供了外部约束的可能。村庄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村民之间必然在各方面发生关联。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如果被贴上“不孝”“虐待老人”的标签,将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受到村里人的排斥,而人们会用孝顺的行动来“洗刷”掉恶名和标签,这是社区舆论的作用。而村集体福利则是村庄给家庭养老带来的硬约束,村庄可以通过暂停发放福利的方式“逼迫”子女照顾老人,起到威慑的作用。村庄集体记忆、社区舆论和集体福利三者对个体的行为形塑和约束从内到外,手段从软到硬,程度从弱到强。以上三点在家庭外部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可能性,解释了农村老年人在社会变革期社会保障不力的情况下依然得以养老的原因。

需要清楚的是,我们分析的是在保障力度不大而村庄内在社会文化和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养老得以持续的原因。这种家庭养老模式目前尚可维持,其背后有社区情理的约束,但并不意味着目前农村的养老支持已经足以让老年人生活无忧。事实上,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尚处于发展阶段,许多保障和福利只能靠农村家庭来提供,社区情理的约束只是一方面,而全覆盖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才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根本方式。

农村社保体系和照料体系的建设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重大,不仅能让老人直接提升经济收入,让老人在子女面前挺直腰杆,而且也使得老年人在家庭内部获得足够养老资源成为可能。前文提到,集体福利让村集体对子女的养老行为有约束作用,同时父母获得的集体福利和社保也让子女的孝敬行为“有利可图”。因此,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让社会保障体系公平公正覆盖全体老年人,是广大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和家庭照料的保障,也是社会主义公平性的体现。同时,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仅依靠家庭远远不够。当下长期护理保险正在试点中,城市中的养老服务组织和机构正在蓬勃发展,逐渐构建起基本社会养老护理服务体系。但这种服

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却鲜有存在，需要地方政府在财政能力可以支持的情况下逐渐推广。受研究主题和篇幅限制，本文无法对此加以过多讨论，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只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互为补充，才能早日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困境。

#### 参考文献：

- 陈文玲，2008，《集体记忆、村庄舆论与社区秩序》，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 范成杰，2013，《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费孝通，1983，《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1998，《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 哈布瓦赫，莫里斯，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贺雪峰，2000，《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第3期。
- 梁晨，2019，《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燕舞，2016，《农村家庭养老之殇——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视角》，《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
- 王明珂，2003，《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王雪娇，2019，《农村家庭结构变迁及其对农村养老方式的影响》，《西部学刊》第9期。
- 王跃生，2010，《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和经验分析——以北方农村为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第4期。
- 魏后凯、杜志雄编，2020，《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聚焦“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农村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阎云翔，2012，《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杨国枢，2006，《中国人孝道的概念分析》，杨国枢编《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杨菊华、李路路，2009，《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于长永、代志明、马瑞丽，2017，《现实与预期：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 张川川、陈斌开，2014，《“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1期。
- 钟涨宝、杨柳，2016，《转型期农村家庭养老困境解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Goode, W. J.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云蔚

the increase in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 children’s instrumental support and emotional support are increasing even if their economic support remains at a relatively stable level.

Collective Memory ,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Village Welfare: The Sustainable Family Support System for the Elderly ..... *Liang Chen* 196

**Abstract:** In China’s vast underdeveloped rural areas , the aging probl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prominent due to the great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defect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village in Hebei province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ural elderly’s behavioral logic and the village’s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aints. Moreover , it explains why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can be sustained when the family structure transform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village community experience and various constraints embodied in “collective memory ,” “community consensus ,” and “village welfare” affect the family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From the internal aspect , the inheritance of village community experience always shapes collective memory , which gives older adults the experience of achieving the goal of receiving offspring’s support to maintain family harmony. From the external aspect , community consensus and village welfare constrain children’s neglect of filial duties.

Does the Middle Class Participate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More? Multiple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Pressure ..... *He Xiaobin , Xu Minxia & Zheng Lu* 210

**Abstract:** Drawing on data from CGSS2015 ,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middle class is more inclined to invest in financial products. However ,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e middle class is restrained by the socioeconomic pressure brought by their class characteristics. Those who do not own real properties and have minor children to raise invest less in financial products than those who own real estate and have no child. Moreover , the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s of real estate and minor children’s supporting burden on financial investment participation are only significant for the middle class , but not significant for the upper class. This paper examines people’s engagement in financial inves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structure and finds that their engagement is affect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ack.

Local Actions in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 *Fu Yuqi* 225

**Abstract:**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a process connecting local foundations with policy guidance in social changes , wherein top-down rational planning and perceptual order of local society are mixed. Based on a case of the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n a county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policy understanding and strategy construction mechanisms. It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dopt a series of strategies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pilot project construction , establish key tasks , and mobilize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into construction practice. The macro-policy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 is a “trigger” for the local society to integrate resources. Also , the localized interpretation of higher-level policies shap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us overcomes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between macro-policy and specific situations.